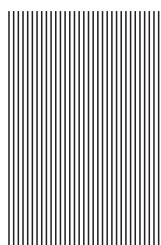


【谷苞学术思想研究】

[主持人语] 诸位,众所周知,谷苞先生青年时期即是西南联大“魁阁”成员,从滇至陇,1949年参军抵达新疆。他长期从事从南到北民族地区田野调查,同时与时俱进,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性与民族团结研究;是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出主要贡献者之一。他从事的南北各族群的民族志调查报告,成为后来者一笔弥足珍贵的学术财富。

当前我们正遵循党与国家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主线的指示,隆重庆祝建党百年,同心同德启航新征程之际,重温谷苞先生一生忠心耿耿,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团结,既是“他者”更是“自我”地安于前沿与基层第一线的学术思想、学术精神、学术品质和人品,充分体现了大家“承继前人学脉,涵泳学术新篇”的心愿。这是深具现实意义的。谢谢。

郝苏民(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谷苞的民族研究： 从社会类型比较到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解释

[文章编号]1001-5558(2021)01-0047-14

● 李如东

摘要:文章以谷苞先生在学术生涯早期参与的魁阁研究为起点,追踪其学术研究的流

※ 感谢匿名评审人和尹韬的修改建议以及马继的校读,但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译苏联民族研究著述的整理与研究(1949-1966)”(编号:2020-GMF-00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20-12-13

[作者简介] 李如东,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西安 710119

西北民族研究
N.W.Journal of Ethnology

2021年第1期(总第108期)
2021.No.1(Total No.108)

变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讨论其西北民族研究的问题意识、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内在理路。谷先生的民族研究在继承魁阁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方法的同时又对其扬弃,形成了一种综合社会调查、经济类型学与文化史研究的民族学。这一风格的民族学基于谷先生之西北民族研究经验与中国民族学的整体观照发展而来,并在其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阐释中得到集中体现。谷先生的民族学对于理解西北民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仍有价值。

关键词:谷苞;民族学;魁阁研究;西北民族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86/j.cnki.62-1035/d.20210202.004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学研究存在如下认识:它被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所笼罩(或被其他学科的区域研究所笼罩);在某些语境中它被等同于民族史研究与民族问题研究。这些认识部分接近西北民族学研究的实况,但却有失偏颇。西北民族学研究诚然受到史地学传统的影响并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史取向,但这不应该成为被诟病之处,相反,这应该成为该区域民族研究的优势。而那种将西北民族学研究等同于民族问题研究的看法如果不是出于偏见,至少也是某种程度的误解。这种误解表面上是将西北民族研究注重视现实问题研究的取向归置为“问题研究”(problem study),实质则是将民族视为问题^①[1][2];从学理上来说则是将西北地区的民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学整体语境相割裂的结果。

中国民族学无疑将民族视为基本研究对象,其研究既包括对各民族的具体研究,也有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研究;它对是参照“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构建继承了“帝制中国”的疆域与民族的现代中国亦有长期讨论(甚或争论)。在这些问题域下,西北地区的民族研究较多从民族史、民族关系(因应民族团结的现实议题)、民族认同(尤其是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现状的调查等切入中国民族学的整体研究框架。这的确让西北民族学的历时研究带上了鲜明的史学风格,而其共时研究则又呈现出明显的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应用性特征。但事实上,这两种风格并非西北地区的民族学研究所独有,在其他区域的民族学研究乃至中国民族学的整体风格中亦不难发现^[3]。

近年来,随着走廊视域在西北民族研究中被强调,部分学者试图以带有区域视角的民族研究整合西北民族研究中的民族史、民族关系与现状调查研究等面向^[4]。在此语境中,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21世纪初持续在西北地区展开民族学研究的谷苞先生及其学说被更多学者所关注。黄达远、张亚辉分别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与边疆民族的社会组织结

^① 目前中国学界对民族的问题化已有不少反思。一种认为民族作为问题实乃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张力的产物;另外一种则认为民族问题化实质上是对民族含义的单义性解释之结果。

构两个维度重新阐发了谷先生民族学的两个层面^{[5][6]};李正元从学术史角度编选了谷先生1949年之前社会调查研究与1978年后有关中华民族共同性论述的文章^[7];唐亚男则在梳理谷先生1983年之前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对其学术研究(尤其是谷先生的新疆研究)进行了讨论^[8]。谷先生民族学的“再发现”虽然颇有制造学术热点之嫌,但更多是因为他始终以中国民族学的整体观照来从事西北民族研究。重读谷先生的著述,并非仅在讨论其具体的民族研究,而是旨在通过重审其论说,将西北民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学的整体研究关联起来思考。

职是之故,本文尝试以现代中国民族学发轫初期的魁阁研究之学术旨趣为起点,追踪谷先生民族学研究的轨迹及其基本内涵,并将讨论重点放在其1980年代有关“多民族国家”的论述之上。笔者认为,虽然谷先生的民族学研究也关注魁阁研究时期的中国现代转型议题,但不同的是,基于西北地区民族社会与历史研究的经验和理论思考,他对该议题的观照从社会的现代化转向了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并逐步发展出综合了社会调查、文化史与马克思社会形态学的研究路径。需提前指出的是,本文并非谷先生民族学研究的学术史考察,而只是借助学术史的问题意识来观察和勾勒其学术研究的变化与整体轮廓而已。在具体行文中,笔者将不会对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作考述。

二、作为理解谷先生民族学研究起点的魁阁研究

1941年,谷先生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随后在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建、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以下简称为“研究室”)开启了其早期的学术研究。从1941年到1944年间,谷先生与张之毅、田汝康、史国衡等在费先生的指导下进行云南乡村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此期间曾得到陶云逵、吴之椿的指导,并写成《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9]408-409}。时值抗日战争,为躲避日军的空袭,研究室转移到云南省昆明市郊呈贡的魁星阁开展工作,这群学者于此期间的学术活动因此被后人称为“魁阁研究”^{[10]49-65}。谷先生在晚年回忆录与诸多访谈中多次说道:“魁阁的三年学徒生活影响了我的一生”,尤其是社区调查研究与注重实践的治学精神^[11]。显然,魁阁研究不仅是谷先生学术生涯的开端,亦可作为理解其民族学研究的起点。因此,对此阶段中国学者之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方法作一交代,将有助于后文的讨论。

魁阁研究由费先生主导。刚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回国的费先生不仅将此期间的研究作为践行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实验,也将其视为认识中国整体社会的途径。就此,费先生在魁阁期间与张之毅合作完成的《云南三村》的序言有一段夫子自道:

我当时(按:写作《江村经济》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

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我一向认为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怎样解决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12]3}。

研究室的学术探索延续了费先生在《江村经济》中的议题,即受传统土地制度束缚与现代资本主义冲击的中国农村社会如何完成其现代转型^{[13]264}。费先生希望通过社区调查建立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设计了数个乡村的实地调查,内容涉及土地制度、乡村手工业、基层社会结构以及宗教仪式,希望在数个典型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作类型比较,“由局部接近全体……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12]8},进而达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此外,费先生还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作了研究和讨论。这项研究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乡土社会乃礼治社会,其运作依赖礼制的社会化^[14]。为进一步认识中国整体社会特征,费先生及其学生还将社会结构的分析拓展到历史时期,并与吴晗等历史学家合作举办工作坊探讨中国社会中皇权与绅权并行的双轨政治结构^[15]。

对于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一议题,费先生综合江村经验与英国经济学家托尼(R.H.Tawney, 1880—1962年)对英国农村现代化的研究,认为乡村社会现代化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路径^[16]。无论是费先生指导的张之毅的研究^{[17]22-25},还是其他魁阁成员的经济研究^{[18]83-94},抑或是对“非汉民族”的研究^[19],魁阁成员的学术探索均在此问题意识的观照下展开。而在具体研究中,受英国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的影响,社区调查、席明纳(seminar)与类型比较成为学者们获取经验材料和展开理论综合的主要方式。在1947年的一篇文章中,费先生如此总结魁阁研究的议题与方法:“研究的区域虽则只限于一定的社区:乡村、部落或工厂,但是他们(按:指魁阁成员)所研究的问题却是中国各种及各地区所共同遭遇的,那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因之,他们可以把不同的标本加以比较,而形成启发继续研究的假设,也就是社会学的理论。”^{[20]417}1944年秋天,在魁阁学习和工作了三年的谷先生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方法离开昆明,前往中国西北从事民族研究,并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民族学研究之路。

三、谷先生的西北民族研究及其范式

参照谷先生公开发表的著述,其西北民族研究大概可以分为1944—1949年甘肃卓尼地区民族社会与河西走廊农村社会调查研究,1949—1962年新疆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与1978—2012年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理论与历史研究三个阶段^{①[8]}。在第一阶段,谷先生

① 唐亚男按照时间顺序对谷先生在西北地区的民族研究与著述进行了梳理和介绍。据其分类,谷先生的西北民族研究有两个阶段,一为1944—1949年的甘肃调查;二为1949—1983年的新疆工作。与此不同,笔者将依据谷先生民族研究的内在线索作分类,对其在“文革”期间的研究搁置不论。

将魁阁研究的学术议题——权力结构与乡村经济研究拓展到卓尼土司制度与河西绿洲农村社会的研究,同时亦运用了社区调查与类型比较研究法^①[7]176-194;在第二阶段,谷先生将马克思、列宁的社会形态学与社区研究法结合起来,对新疆绿洲农业社会与牧区社会组织展开了研究;在最后一个阶段,他则将在社会历史调查中积累的学术经验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集中解释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在这三个逐步推进但又有所扬弃的研究过程中,谷先生探索出了别具一格的民族学范式。这种范式不同于魁阁研究时期由个别到整体来认识中国的思路,而是开始从整体视域解释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并以社会阶段论分析中国的现代转型。

(一)对农牧区社会形态的调查与研究

对于谷先生第一阶段的西北民族研究,张亚辉已作过专门研究。张氏在其研究中认为谷先生转换了费先生从江村经济挪移到魁阁研究中的路径(一种将乡村社会置于土地制度与世界市场之关系中分析的经济人类学路径),并将之拓展为“边疆整体的政治经济关系研究”。张氏认为这为此后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建构提供了讨论空间^{[5]133}。此外,李正元对谷先生的河西农村经济研究进行了讨论,认为该研究已经超越了费先生那种将社区视为整体的研究路径,关注到了社区之外的联系及其历史因素^[21]。笔者同意张、李二氏对谷先生之西北民族研究第一阶段的讨论,故不再对之重复研究,而是直接转入对谷先生有关西北民族社会形态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等议题的讨论之上。

1949—1962年,谷先生前后参与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改为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组织的南疆农牧区社会调查(1950—1953年),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分组的调查研究工作(1956—1962年)。这两个阶段的调查任务各有不同,前者主要是为新疆的减租反霸与土地改革运动作准备,后者则是为了配合对民族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两者都以马克思、列宁有关社会形态的理论以及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为纲本,且后一阶段的调查研究沿用了不少第一阶段的调查成果。谷先生在两个阶段都作为学术组织者和调查员深度参与其中,对新疆农牧区的社会形态划分做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工作^[22]。

在南疆农村,谷先生及其同事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该区域内存在的封建农奴制度,相关论述结集在《南疆农村》中出版^[23]。该书收录了12个典型乡村的调查报告,代表了南疆封建社会的三种类型^②[24]147-149,同时亦有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水利、政权、手工业、集市和文化教育等专题的调查报告^[23]。而在牧区,调查的重点围绕蒙古族与哈萨克族的社会组

① 此一阶段的研究在李正元主编的《故土新知》中有集中体现,其对类型学的运用在《甘肃会宁县农家经济概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② 这三种类型后来被谷先生表述为“封建农奴制完整存在的农村”“无偿劳役与对分制普遍存在的农村”与“一些县城的郊区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农村”。

织阿寅勒(蒙古族)和阿吾勒(哈萨克族)展开,具体内容涉及剥削关系、行政权力与宗教生活等^[25]^[26]³²⁰⁻³⁵⁵,研究者认为游牧社会中存在一种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度^[27]。谷先生不仅参与,而且在学术上对这两项调查研究作了指导。很明显,虽然这两项调查研究在理论与话语上不同于魁阁研究,但该时期的社区研究法(典型研究)与类型比较法仍被加以应用。

但与此同时,在进行社会形态学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谷先生也发展出了不同于魁阁研究的社会类型学(或社会研究路径)。在此新的社会类型学中,经济类型而非社会结构(组织)成为划分社会类型的基础。此种社会类型学显然吸收了马克思社会形态学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分析路径。事实上,谷先生的这种社会研究路径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多数研究者都曾采用过的,林耀华先生曾对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理论建构,发展出某种中国的马克思人类学理论——经济文化类型学^[28]⁸⁰⁻⁹⁸。还需注意的是,谷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历史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农牧区经济互补的关系结构也为他此后论述历史上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关系提供了经验基础。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谷先生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促使他逐步介入西北民族史的研究之中。此研究方向的调整虽然与相应的历史语境不无关系,但也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如我们所知,受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1962年至1978年间,谷先生将研究重点逐步调整到历史领域,并与其同事共同完成了《新疆历史丛话》的写作和出版^[29]。谷先生的这一学术方向调整无疑与其在新疆的民族研究经验有关。在某次接受访谈时他这样说道:

随着自己在新疆民族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发现自己原有的知识面很窄,不能适应需要,首先我感到急需充实民族史、新疆史和宗教学方面的知识。为此,我查阅了二十四史中有关西域传和我国北方的民族传记,并阅读了一些近代我国和外国学者的有关著作。这样,日积月累,使我的知识结构有所扩大和更新^[30]³⁰⁵。

显然,谷先生在此一时期历史知识的积累为其在1978年之后围绕多民族统一之中国展开的历史解释奠定了学术基础。

(二)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解释

谷先生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解释有着学术关怀与个人情感因素。据其所言,在认识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一书中“部族发展成民族和国家”的论断,以及中国历史上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事实之后,他就把巩固祖国统一和维护民族团结(包括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作为其后半生的重要研究课题^[30]³⁰⁵。谷先生对此课题的历史解释从民族关系和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谱系两个层面展开,对前者

的论述主要从文化史切入,而对后者的论述则采取了长时段的历史分析路径。

1. 以文化史解释民族关系

谷先生以文化史阐释民族关系的论述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古代新疆音乐与舞蹈的研究中,此项研究的成果从1978年至1986年陆续见诸报端,后被结集进《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以下简称《音乐与舞蹈》)一书出版^[31]。谷先生的此项研究有着明确的问题关注和对话对象,它主要回应边疆文化史研究中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以下简称“西来说”)以及时人对新疆文化史认识的误区。谷先生认为,“西来说”“愈来愈没有人相信了。但是,中华文化西来说,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不时还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的边境地区,如对新疆,他们(按:指持‘西来说’者)肆意夸大希腊文化的影响,贬低或抹煞汉族文化的影响。”^{[31]2}而在《音乐与舞蹈》一书中,谷先生的具体对话对象则是向达先生有关龟兹乐舞源于印度的论说^①^{[32]264·267}。与此同时,谷先生还指出,在其写作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对新疆文化史的认识存在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1)古代新疆之音乐与舞蹈(龟兹乐舞)文化与今日之新疆人民没有关系;(2)今日新疆之乐舞并无古代文化之要素;(3)唐朝以后新疆少数民族和汉族以及内地各少数民族在音乐文化上的交流中断了^{[31]41}。

谷先生认为上述观点都站不住脚。他在《音乐与舞蹈》的前言部分首先从理论与历史层面逐一驳斥了“西来说”与古代新疆“故无文化”(向达语)的观点。谷先生认为,文化传播乃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区域文化多由相应群体吸收其他文化后结合已有的文化创造发展而来;中原文化对新疆文化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以新疆和中原较为悠远的联系为基础,并在历史进程中得到强化;古代新疆的乐舞文化建立在其封建经济基础之上,是当地封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封建文化大约在公元3世纪之后就已经形成了^{[31]1-3}。谷先生综合大量传统史料对古龟兹舞、乞寒舞与《西凉乐》《鼓吹乐》《龟兹乐》《十二木卡姆》等展开了细致的文化史研究,其结论总结起来有三点:(1)古代新疆的乐舞受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颇多,它由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2)得益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古代新疆的乐舞也吸纳了域外印度与波斯等的文化要素,但这种影响是双向的,由各族共创的古代西域乐舞也在邻近区域得到传播。(3)中原地区不少乐舞亦受到古代新疆乐舞文化的影响;今日新疆的乐舞是在古代新疆乐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非外来文化^[31]。

显然,谷先生对古代新疆乐舞的研究既是在回应相关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在论述民族关系史。通过对古代新疆乐舞的文化史研究,谷先生既阐发了新疆乐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叙述了新疆各民族及其与内地诸民族交往交流的关系史,以及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轨迹。不同于常见的以人群(民族)互动为主要论述内容的民族关系史研

① 向达认为,“自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绪余,龟兹本国故无文化”。在将《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唐六典》《通典》之龟兹部与天竺部比较之后,向氏认为龟兹乐来自印度,“龟兹乐之出于天竺乐,其说固不得诋为无稽矣”。

究,谷先生的此项研究既兼顾了各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又始终将这种主体性置于各民族文化的关联性与共同性之中加以解释。我们将看到,此项研究关注的问题与研究方法和谷先生在大约同一时期展开的有关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研究是一致的^{[30]1-26[33]}。

2. 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历史解释

完成新疆乐舞的文化史研究之后,谷先生从1985年末到1986年初连续发表了《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与《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两篇文章^{[9]1-34},继续深化他对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解释。谷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形成首先是因为作为文明国家,中国的历史由具有不同社会形态与文化的诸多民族共同缔造;而秦汉以来,中国长期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存在,这使各民族之间有着密切而持续的联系和交流,从而产生了相互依存、互促互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上形成了许多共同点。其次,这种共同性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民族融合关系颇多^{[9]3},这两个历史过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的作用”^{[9]2}。谷先生根据语言文字、经济生活、音乐舞蹈、神话故事、民间传说、节日等文化事项论述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及共性^{[9]8},并发挥了费先生1984年在国家民委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观点,认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之间是一种“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客观事实”^{[9]16}。总而言之,谷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都可发现,而这些共同性的形成既有赖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长期存在,又和历史上的移民和民族融合关系密切。

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的共性之外,谷先生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论述的另一层面是对多民族统一国家谱系的文化解释,而被置于这一议题核心的则是中国各民族神话中的大一统思想。谷先生认为,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发轫于夏商周时期的天下共主观念,该思想在秦汉、唐宋时期得到明确和巩固。谷先生的这个结论基于其对汉语史籍与各少数民族神话传说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了诸多神话传说之后,谷先生发现,中国各民族的统治阶级(王朝建立者)大多有着共享的神圣王权谱系。在北方,除为数不多的政权创立者将其谱系追溯到盘古与炎帝之外,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绝大部分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而在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则把盘古、伏羲与女娲作为自己的远祖^{[9]27}。在谷先生看来,这些由大多数民族共享的神话传说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强大的精神上的凝聚力”;各民族神话传说中的矛盾之处乃历史上诸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由大多数民族共同追溯的黄帝和炎帝传说则可看作大一统思想的象征和旗帜^{[9]28-29}。他同时也指出,这种发轫于夏商周时期,发展和巩固于秦汉、唐宋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代政权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延续,中原政权编修少数民族建立过的政权之历史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继承中原之文化典籍即是明证。由此,谷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传统^{[9]32}。显然,谷先生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论述试图阐释的是中国作

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事实,而在有关农牧关系的讨论中,他解释了此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社会机制。

3. 以经济类型学解释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社会机制

谷先生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形成的历史轨迹之讨论是从农业区与游牧区的关系切入的。谷先生依据经济类型将中国划分为三大区域——黄河、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农业区,长城以北的北方游牧区以及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区域的西方游牧区,三个区域并存着互不相同的生产体系。农业区与游牧区在政治上大一统的形成也即是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形成,因此需在承认游牧社会对中国历史之贡献的基础上方能全面分析多民族统一之中国形成的历史轨迹^{[9]107[34]}。

谷先生认为大一统之中国的形成有经济、文化与历史因素。首先,农业区与游牧区经济上长期存在互补关系,相互促进。这种经济互补与游牧区的经济不自足有颇多关系,由此使得农业区在这种彼此依存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如其在论述中华民族共同性时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农业区还是在游牧区,都存在着大一统的思想。此外,秦和匈奴分别在农业区和游牧区完成的统一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基础。随着农业区拓展到毗邻长城的北方游牧区,以及西汉设置河西四郡后河西地区的农业化,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南北对峙结束,南疆诸绿洲农业区与内地也建立起更为密切的联系。这些经济层面的变化为大一统的中国奠定了历史基础^{①[9]}。谷先生写道:“汉、唐两朝曾在这方面(统一农牧两种社会)取得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元朝全部实现了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清朝最后完成和巩固了这个大一统。”^{②[9]106}

谷先生对大一统之中国的论述综合了社会历史调查阶段积累的经验、社会经济类型学以及文化史分析路径。在其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经济类型的群体以及这些群体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变(而非不同群体的政治关系)是谷先生阐释多民族统一之中国形成的核心内容。这种分析路径在观照各民族因经济类型与社会形态不同而具有的差异性之同时,又不拘泥于民族这一分析单位,而是更多地关注各民族基于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关联性与文化共性。

4. 以社会阶段论解释中国的现代转型

谷先生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解释并未停留在历史时期,而是进一步论述了其现代转型。在谷先生看来,中国的现代转型是处于不同社会阶段的各民族全体从阶级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伴随着这个历史条件的巨大变化,全国各民族在不同的起点上:分别从

① 谷先生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形成的历史解释主要集中在《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为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一百周年而作》《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和《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通畅的关键》等文章中,尤其集中在《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本段的论述基于总结以上诸篇文章而来。

② 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

残存的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30]161-62}。这个转型是中国近代变革过程中的一大飞跃,它是中华民族的总体变革,而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一切变革也在这一变革的“总格局中进行”^{[30]201[35]}。

谷先生对中国的现代转型之论述同样可以拓展到各民族之现代化这一层面。谷先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整体现代化,其主要的目标是“逐步缩短直到完全消除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先进民族的差距”,“逐步缩短直至完全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差距,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30]202}。但由于我国大多数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布于全国各个地区,“因此,不可能设想以民族为单位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必须以地区为依托来进行各民族社会的现代化。只有某些民族居住地区实现了现代化,这些民族的社会也就现代化了”^{[30]70[36]}。如果我们回望魁阁研究以社会现代化观照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就不难发现,谷先生此时已将社会替换为民族,且又将民族的现代化置于区域之中讨论。

毫无疑问,谷先生认为中国在20世纪中叶所完成的社会主义转型延续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体结构。中国的现代转型是通过国家的整体变革来实现的,而这一转型的核心是社会性质的总体改变。各民族的现代转型与中华民族的转型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他们在总体格局中完成其社会性质的变革。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是在国家现代转型之后同步开启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全面现代化成为变革之后中国需要长期奋斗的目标。显然,与魁阁研究从社会现代化角度观察中国的现代转型不同,谷先生是以国家的现代转型来观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同样,与魁阁研究从社会结构变迁角度讨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不同,谷先生对此议题采取的是社会阶段论的解释。

四、回到魁阁研究看谷先生的民族学研究(兼结语)

被费先生称为“魁阁老人”^{[24]228}的谷先生虽然仅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参与魁阁研究,但其研究的问题意识、学术方法与学缘始终与之呼应。前文已指出,谷先生从云南返回西北之后,曾将魁阁研究的学术议题、社区调查方法与类型比较研究带到其在甘肃与新疆地区开展的学术实践之中。但这位主要在西北地区开展研究,且深受马克思社会形态学影响的学者,在民族学研究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都形成了与其他魁阁老人不同的路数。重新回到魁阁研究审视谷先生的民族学,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整体图景及其演变,以及西北民族研究在中国民族学中的定位显然有重要价值。

同魁阁研究的大多数参与者一样,谷先生在其研究中也对如何认识中国(或“何为中国”)作了思考和回答。不同的是,前者更多地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认为社会的现代转型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而后者对此问题的思考则逐步转移到国家层面,认为国家的现代化是促成社会转型的关键。前者的认识经验更多来源于内地的农业社会,而后的

认识经验则来源于较为复杂的边疆民族社会。相较而言,魁阁研究时期,研究者更多地在探讨“未来中国”,而20世纪80年代的谷先生则更多地借助历史解释“当下中国”^①[9]89-99。但无论是面向未来思考当下,还是基于过去解释现在,二者都属于进步主义的思路,只不过前者的论述基于现代性的思考之上,而后者则采取了历史阶段论的解释。

在研究方法上,费先生领导之魁阁研究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类型比较研究,试图通过多个案例的横向比较获得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英国人类学家利奇(Sir Edmund Ronald Leach, 1910—1982年)曾对此种研究路径进行过评论,在他看来这种通过对典型社区的研究获得对中国的一般性认识的意图并未实现^[37]127。费先生晚年亦写文章回应了利奇的批评,承认利奇的批评直指他的要害,但他仍然认为通过对诸多典型类型(types)的比较研究是有可能从个别接近整体的,但这种接近是逐步的。《云南三村》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对江村的追踪调查和对东西部地区小城镇的调查研究,即是其通过典型比较逐步接近整体中国的学术努力^[38]5·7·8。相较而言,20世纪四五十年代,谷先生在西北农牧地区的调查虽然也曾延续此种方法,但却逐步发展出基于经济类型的社会形态比较研究,并通过(农牧)经济关系建立起不同社会的关联;而在20世纪80年代论述历史上的农业区与牧区的关系时,谷先生则根据经济关系的互补与依存完成了对整体中国的解释^②[39]。此外,虽然费、谷二位先生都曾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补课,但前者把更多精力放到了西方学者尤其是其年轻时代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派克等人著作的阅读上^[40],而后者则转向中国历史的研读,并发展出文化史与长时段的历史解释路径。在人们对谷先生的学术追述中,除给予他“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的称号之外,的确也有学人将其称为“历史学家”^[41]1-10。

虽然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谷先生与魁阁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学者费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为何”的认识上殊途同归,二者均认为中国乃多民族国家。设若我们将1939年顾颉刚与魁阁研究团队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引入当前的论述语境中^[42],则不难发现,费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谷先生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历史解释似乎均可视为魁阁老人对该问题的回应。有证据表明,费、谷二位先生在多民族国家的思考上曾相互影响。费先生在1988年9月2日写给谷先生的信中说:“从兰州回来,又去烟台,民盟开了一个会,同时抽时间把11月份去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稿写出来,题目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主要是根据我多年积累的想法,又利用你们和

① 谷先生古为今用的历史解释路径与大多数民族学史研究者是一致的。这种路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曾被公开讨论,并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谷先生也曾撰文重提此种历史研究的思路。

② 有趣的是,谷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农牧经济关系解释整体中国的路径与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年)在论述大中国的历史演进时以贮存地解释游牧与农耕社会之关系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他民院同事的论文,综合写成。”^{[24]226}费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的文末也将谷先生有关中华民族共同性和中国历史上之农牧关系的研究文章列为参考文献,这些研究文章也被费先生收录到其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之中^{[43]36}。而谷先生在1989年之后发表的数篇文章中(如同魁阁研究时期那样)亦对费先生的理论作了应用和阐发^{[30]1-38},并于2007年发表《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对其有关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论说进行了总结^{①[24]154-176[44]}。

谷先生在魁阁研究之外逐步探索出的认识和解释多民族国家的路径既与1949年之后中国学界整体思想的转变和他(及其同业者)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的实地调查有颇多关联,同时也与在国家所开展的社会工程(如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培育的中国民族学之(应用性)品格关系密切。任继愈在阅读谷先生《民族研究文选》后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谷先生民族学的特征:

您从事的(民族研究)工作不同于一般理论工作,既要有充足的社会实践为资料,又要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民族研究领域,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不多。您是其中的杰出者,也是具有开创功劳的一位,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很不平坦。您的成就限于印刷在书面上的,在促进民族团结和睦方面,广大民族地区将永远记住您的业绩^{[24]229}。

任继愈的信提示,谷先生的民族研究似乎可视为一种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②[30]216-218},它在某些领域对今日中国民族学、民族史(甚或边疆研究)的学术实践仍有实在影响。

显然,以魁阁研究作为起点理解谷先生的民族研究,的确有助于追踪其学术理路的流变,同时亦能让我们窥见中国民族学整体风格之一斑。谷先生在研究西北民族的过程中逐步将社会类型比较研究发展为经济社会类型研究,再将其议题转移到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解释之过程,既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认识整体中国时规避魁阁研究所曾遭遇的困境之努力,也呈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研究对当代中国民族学之形成及其品格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学科重建后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亦逐渐形成了新的特征。无论是将历史维度(或历史)纳入研究之中,还是对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又或者是对当代语境中的新问题作出回应——如医疗人类学、灾害人类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等等,都从不同层面丰富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内涵,使其在不缺失

① 在文中,谷先生重申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元的,中国乃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炎黄子孙的观念在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等观点。

② 事实上,谷先生在1999年发表于《民族研究》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中国民族研究有两个传统,一为旧传统(历史中的民族记述);另一个则是“新中国建立50年来的新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整体观照的同时^①[45],亦呈现出较为多元的面貌。

参考文献:

- [1] 潘蛟.民族国家与民族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 [2] 张小军.“民族”研究的范式危机——从人类发展视角的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 [3] 周星.应用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J].社会科学战线,1990(3).
- [4] 黄达远,王彦龙,蒯海鲲,等.从河西走廊看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区域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5] 张亚辉.土地制度与边政忧思:谷苞先生的卓尼经济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9(3).
- [6] 黄达远.边疆的空间性:“区域中国”的一种阐释路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论述的新思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 [7] 谷苞,著.李正元,编选.故土新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8] 唐亚男.民族学家谷苞学术史初探(1941—1983)[D].兰州:兰州大学,2020.
- [9] 谷苞.民族研究文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 [10] 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M]//王铭铭,潘乃谷,编.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11] 谷苞.在费孝通老师指导下云南社会学研究室的三年学徒生活影响了我一生[J].西北民族研究,2006(1).
- [12]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 [13]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二卷(1937—1941)[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5]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M].长沙:岳麓书社,2011.
- [16] 杨清媚.土地、市场与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从费孝通与托尼的比较出发[J].社会学研究,2019(4).
- [17] 马雪峰.以社会学知识建设现代中国:张之毅“魁阁”时期的学术实践[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
- [18] 杨清媚.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魁阁时期“燕京学派”的工业研究[J].学海,2020(4).
- [19] 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 [20]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的长成——为《日本社会学年报》写[M]//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五卷(1947).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21] 李正元.社会调查与西北边疆建设:民国时期谷苞农牧民研究的价值及启示[Z].[未发表].
- [22] 谷苞.我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调查[J].西北民族研究,1994(1).
- [23]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丛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辑组,编.南疆农村社会[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① 值得注意的是,刘琪在其最近的文章中借助对魁阁研究两个文本的讨论,认为民族研究需同时观照社会与国家两种整体性。

- [24] 谷芑.民族研究文选:四[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
- [25]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编.巩哈县蒙哈族牧区调查[Z].1950.
- [26] 谷芑.民族研究文选:三[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 [27] 李如东.游牧与封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哈萨克族社会形态划分[Z].[未发表].
- [28]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 [29] 谷芑.新疆历史丛话[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63.
- [30] 谷芑.民族研究文选:二[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 [31] 谷芑.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 [3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33] 谷芑.一个重大问题:正确阐明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关系[J].西北民族研究,2001(1).
- [34] 谷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J].西北民族研究,1993(1).
- [35] 谷芑.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J].西北民族研究,2007(1).
- [36] 谷芑.当前民族学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1986(1).
- [37] Edmund Leach.*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Fontana Press,1982.
- [38]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39] [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40]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41] 纪大椿.将我引入史学研究殿堂的导师——谷芑[C]//刘光华,主编.谷芑先生90华诞纪念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
- [42] 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43]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 [44] 谷芑.关于如何正确理解炎黄子孙的探索[J].西北民族研究,1995(2).
- [45] 刘琪.缺失的“民族”与整体的“社会”——从魁阁时期的两个研究文本谈起[J].学术月刊,2020(11).

(学术编辑:哈 德;责任编辑:杨建军)